

西德近代中國問題研究之概況

李國祁

就歐洲而言，德國有關中國問題之研究興起較晚，雖然如萊比尼茲 (Leibniz) 等早於十七八世紀即對中國文化感有興趣，但對中國學術作真正深入之研究者，則仍推十九世紀。最初有柏拉特 (Joseph Plath) 關於中國哲學宗教之研究，繼之則有費茲馬爾 (Phiz Maier) 關於中國史書如史記等片段之翻譯。稍晚花之安 (Ernst Faber) 與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繼起。對中國經典作有系統之翻譯。花之安為德籍傳教士，同治年間來華，日後為廣學會負責人之一，除經常於萬國公報介紹西方政教文化外，且翻譯中國經典為德文。衛禮賢為二十世紀前期德國大漢學家，先後將四書禮記等翻譯為德文。氏對易經亦有研究。在歷史方面，用現代方法研究中國史者，在德國鄂托佛郎克 (Otto Franke 1863-1946) 實為第一人。他根據資治通鑑寫成之五巨冊中國史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erlin, 1930-1952)，確是一劃時代之巨著。就究研所而論，大約當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如萊比錫大學柏林鴻博大學及佛蘭克佛大學漢堡大學均有東亞究研所或中國究研所之設立。故就一般而論，德國關於中國問題之究研，當廿世紀二三十年代間，已相當發達。但自希特勒當政，厲行排猶政策，大批德籍猶太學者被迫離德，多數移居美國，遂使德國學術由盛而衰，其中國學研究受影響亦巨。迨二次大戰後，國家殘破，德國整個學術研究極為凋零，人才貧乏，並形成青黃不接之現象，一切須重新建立，漢學界情形尤然。近年來德國經濟復興，學術研究亦因經濟之繁榮蒸蒸日上，各大學紛紛設立東亞究研所，中國學之研究欣欣向榮，更因實際需要及受時代風尚之影響，近代中國問題已成為西德中國學研究之重心。

目前西德幾乎各大學均有東亞研究所，研究中國學及日本學。但其性質多偏重於語言之訓練，而且規模極小，

難與美國相比。真正研究近代中國問題之中心，大約有四：即漢堡大學，慕尼黑大學，及新近成立之博洪城魯爾大學與屬於漢堡市之亞洲研究所。

漢堡大學之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所 (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該所原係鄂托佛郎克講學之地，藏書頗豐。再則漢堡為德國遠洋貿易之商埠，與遠東關係極深。漢堡大學之前身原係殖民研究所 (Kolonial-Institut)，故注重海外研究已成為該大學特色之一。因此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所得天獨厚，以研究中國歷史及現勢為其傳統。鄂托佛郎克清季時曾任職德駐華使館，對清政府之腐敗，及甲午戰後列強全面謀我，均曾親身目睹。故其本人非僅注重中國歷史之研究，亦極端注重近代中國之研究。發表有關此方面之論著甚多。其於中國政治宗教問題並倡所謂 Caesaro-papismus 一說，認為中國政教合一，集大權於皇帝一身，無西洋政教分立之二元主義現象。

其東西兩世界之回憶錄 (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 Berlin 1954) 與一八九四至一九一四年間在東亞之列強 (Die Großmächte in Ostasien von 1894-1914, Braunschweig 1923) 兩書均為治中德關係必讀之書。前者存有甚多其本人親自經歷之中德交涉史料，後者係根據德國外交檔案寫成，均具極高價值。鄂托佛郎克先生極具史才，治學又勤，其能成為德國中國學一方之泰斗，絕非偶然。氏卒於一九四六年。漢堡中國史之教席遂由其子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接替。傅吾康先生子繼父業，非僅能克紹其裘，而且竭力經營，使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所日益擴充，人才輩出，今日德國漢學界重要人物甚多出其門下。傅吾康亦如其父，早年於取得博士學位後，即來華深造，客居北京多年。夫人並為中國人。家中由於父子兩代之收集，藏書極豐，尤多明善本。傅氏因其父中國史僅寫及元代，故志在繼父遺志，完成元以下之中國史，因此極端注重明史之研究，久已成為舉世所共知之明史專家矣。其弟子亦泰半政治明史，然氏親身經歷二次大戰後中國之變亂，並受當代研究風尚之影響，亦從事近代中國

問題之研究，先後著有中國傳統考試制度之改革與廢除（*The Reform and Aboli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1960）；百年來的中國革命（*Das Jahrhundert der Chinesischen Revolution*, Oldenburg 1959）；中國與西方（*China und Abendland*）等書。此因治明史，頗有意將中國近代史上推至明。於近代中國問題氏特別注重知識份子所發生之作用，故於康有為之變法，及五四運動尤為注重。關於當代中國問題之研究，氏於中國語言文化所經常開有中共歷史寫法諸課程。

近年來西德各大學紛紛擴充中國學研究設備，漢堡既為一具有歷史之研究中心，自是不甘落後，故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所近復增設一中國文學講座，由國人劉茂才先生擔任。劉先生籍隸東北，居德近三十年，初攻經濟學，後治中國中古史，復轉興趣於文學語言方面，為國人中唯一正式取得德教授資格者，著述甚多，其中漢語手冊一書，為目前德各大學通用之中文文法教科書。

期刊方面由漢堡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所主編者計有兩種：一、為遠東雜誌（*Oriens Extremus*），為德國僅有之純東方問題學術雜誌。雖名義上言係由漢學家多人共同主編，而實際上却是中國語言文化研究所負責。一為東亞自然與民族學學會消息（*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ölkerkunde Ostasiens*），此由該所中文部門負責，規模較小。

慕尼黑在西德素有文化城之雅稱，其大學規模居全國之最。中國學之研究所係由海伯特佛郎克（Herbert Franke）負責，極具聲譽，與漢堡研究所南北對峙，各據一方，為二次大戰後西德僅存之兩中國問題研究中心。今日西德漢學界年青人物，大多出於此兩研究所。故有南北兩佛郎克平分西德中國研究之稱。此說雖過武斷，然亦可見此兩研究所規模之大與兩佛郎克在中國學方面之造詣矣。海伯特佛郎克治學極廣，著述極豐，早年則以治蒙古

史聞名，著有蒙古統治下中國的貨幣與經濟 (*Geld und Wirtschaft in China unter Mongolenherrschaft*, Leipzig 1949) 等書，該所既為有歷史之研究所，故藏書亦豐，再則慕尼黑國家圖書館收藏東方書籍甚多，該館東方部為柏拉特所創立，極具歷史。為目下西德著名收藏東方資料圖書館之一。海伯特佛郎克先生既注重研究中國中古史，故其弟子亦多偏重於此方面。最著名者為包爾 (Wolfgang Bauer)，氏研究中國秦漢以下迄魏晉南北朝之思想史，主持海德堡大學東亞研究所，去秋歐洲漢學會議作者曾聆其關於中國憲法之報告，工力深厚，確為德漢學界後起之秀。包氏旋因慕尼黑研究所添設第二位中國學講座，前往助其師主持中國思想史研究計劃，並着手研究中國學術思想對德國之影響之專題。慕尼黑研究所雖有研究中國中上古史之傳統，但近來受時代潮流之影響，亦謀從事近代中國之研究，上述中國學術思想對德國之影響之研究計劃，即為其中之一。

博洪城魯爾大學 (Ruhr-Universität Bochum) 成立於一九六五年，為西德最近成立之大學。一般德國大學由於歷史悠久，學制古老，風氣過於保守，難於適應當前分工合作之學術研究需要，進步與改革更是不易。德人有鑒於此，遂決心創辦新制大學，糾正傳統學制之各項缺點。魯爾大學即為就此種理想而成立之第一所新制大學。其特點在廢除舊有之文理法等大型學院制度，而以相關科學組合成立小型學院，俾增進各相關科學間之合作。故魯爾大學學院竟達十三個之多，且仍在不斷增設中。其名稱有歷史學院、地學院等等。該校另一特色即成立與學院地位相等之院際研究所，俾增進各學院間之合作，東亞研究所 (Ostasiens-Institut) 即其中之一。

在學術方面，德人因鑑於東亞研究過於落後，為謀急起直追起見，故決定以此為魯爾大學研究重點之一。其東亞研究所規模之大，組織之新，非僅為西德之最，並聞有意於力加擴充，使之成為歐洲研究東亞問題之最大中心。

魯爾大學東亞研究所目前以四個學系為主體，即中國歷史，由葛林 (Grimm) 教授負責；中國語言，由霍福

民(Hoffmann)教授負責；日本歷史，由哈密支(Hammitzsch)教授負責；日本語言，由列文(Lewin)教授負責。所長則由該四系教授輪流擔任。在人事編制上該四系分屬歷史學院及語言學院。但在學術上則又合而為一，構成一整體。除該四系外，其他各學系有研究東亞問題者，亦納入東亞所。如地理系中研究中國地理之雪勒(Schöller)教授，經濟系中研究中國經濟之克勞斯(Kraus)教授，政治系中研究中國政治思想之韋伯薛佛(Weber-Schäffer)教授。亦均在東亞所佔有一席之地，故目前該所實際上已有七系之多。聞將來陸續擴充，或將增至二十四系科。其規模之大，已可想而知。本文因討論近代中國問題之研究，故擬僅述其中國史系研究情形。

魯爾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史系係由葛林教授負責，氏為傳吾康先生大弟子，故個人研究亦注重明史，著有明代書院制度等書。葛氏為人精明強幹，深感當今中國問題為世界政局中之主體，如欲了解今日之中國問題，勢必須用新方法新觀念，歐洲漢學之舊方法，實不足以應付之。故氏步美國之後塵，注重十九世紀及當代中國問題之研究。氏本人已成為當前西德中共問題專家。自共匪文化大革命後，該系曾連續二學期，開有關於此方面之討論會。可知其對中共問題之注重。但其個人學術研究則仍以明史為主，漸而伸延及於清代，今春氏復開十六世紀中國問題討論會，並欲每學期逐漸向下推展，以至於廿世紀。由此可知，其意亦在將中國近代史上溯至明。氏既注重近代中國之研究，故其做博士論文之學生亦於近代範圍內選擇題目，有作李鴻章者，有作鄭觀應者，有作梁啟超者。由此種趨向，可知該系研究重心，實在於十九廿世紀之中國史。該系另一特色為與魯爾大學近代史系合作，從事中德關係之研究。目今仍在開辦期間，其一切成果均須待之來日。圖書設備方面，魯爾大學東亞所因係新成立者，自難與漢堡慕尼黑兩研究所相比。然該所規模既如此宏大，經費亦較其他中國問題研究所充足，近來復接受美福特基金會補助，數年後迎頭趕上亦是意料中事。故將來德國近代中國問題研究中心，勢必成為鼎足而三，或者更有後來居

上之可能。

漢堡市之亞洲研究所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該所與前述三研究所性質不同，前三者均爲大學研究所，從事教學與研究者，亞洲研究所則爲純粹編譯及研究機構，與教學無關。該所原屬於德外交部，以翻譯貿易協定，收集各項亞洲資料（主要爲中共資料）爲工作重心。魯爾大學中國史系教授葛林曾任該所所長。日後該所改屬漢堡市並予擴充，其工作性質亦稍改爲注重學術研究。現任所長爲葛羅斯曼（Großmann）。由於近年來德國國民汽車廠基金會 (*Volkswagen-Siftung*) 仿美福特基金辦法，每年捐贈大批款項作研究東亞問題之用，由西德漢學界共同成立委員會管理支配，而亞洲研究所則爲主其事者。此一委員會近年來補助甚多集體或個人之研究計劃，而且多偏重於近代中國問題之研究。該所亦資助出版專刊。因此該所逐漸成爲「指導研究工作之中心，但其本身規模則並不宏大。

綜觀上述，可知西德近代中國問題之研究在逐漸發展之中，但如與美國相較，則仍瞠乎其後。究其原因，一則因國家本身對研究中國問題無切身利害之感，故亦無所謂倡導與鼓勵。德人財力究難與美相比，在缺乏精神與財力兩方面之支持下，其發展緩慢自是意料中事。然則另方面實亦因德大學制度過於陳舊保守，教授權力過大，教授相互之間又難合作無間，故美式之分工合作等集體工作辦法，未被有效使用，其未能急速發展，與此大有關係。然此兩弊端漢學界均已注意及，並力謀改進之。如魯爾大學東亞所之設立，即在加強學科間之聯系。漢堡亞洲所之工作，則在改正昔日孤立研究之弊端。故西德近代中國問題研究之突飛猛進，必指日可待矣！